

二十世纪下半叶 鄱阳湖区的“农进渔退”^{*}

吴 贇

摘 要：渔业是鄱阳湖区的传统产业，明清至民国时期在区域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20 世纪下半叶鄱阳湖区出现明显的“农进渔退”，农业主体地位空前加强，渔业迅速衰退。这一进程的动力机制主要包括人口增长、制度与政策变化、便于围垦的自然环境以及稻田比水面更具经济价值等。农进渔退与后来鄱阳湖区乃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生态环境恶化具有因果关系，主要表现为水旱灾害频发和加剧、生物多样性遭到破坏。对此，应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观点予以具体分析，这样才能为产业转化及区域经济的绿色发展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

关键词：鄱阳湖区 农进渔退 湖区农耕化 产业转化 生态

“农进渔退”是指湖区圩堤围垦、围湖造田，推动渔业向农业转化，亦可称之为“湖区农耕化”。它是近世以来鄱阳湖区等中国中东部大江、大河、大湖区域普遍出现的历史现象。鄱阳湖位于长江以南、江西省中北部，其周边有余干、鄱阳、九江和南昌等十二个县市，是鄱阳湖区的核心区域，即为本文所论的鄱阳湖区。随着农进渔退进程的展开，鄱阳湖区经济、生态与社会发生深刻变迁，其中有许多值得总结的历史内涵。遗憾的是，史学界至今对这一问题关注不够。^① 笔者拟从产业转化与生态影响的视角，对 20 世纪下半叶鄱阳湖区农进渔退问题进行讨论。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明清以来鄱阳湖区经济、生态与社会变迁”（13CZS050）、中国博士后基金特别资助项目“明清以来长江中游的湖区农耕化问题研究”（2014T70614）和中国博士后基金面上资助项目“湖区农耕化与明清以来鄱阳湖区社会变迁”（2013M540533）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匿名审稿专家对本文提出了宝贵意见。

① 相关研究成果：方志远提出与湖广一起使“天下足”的还有江西，江西和湖北、湖南共同构成了明清时期中国最大的商品粮供应地。（参见方志远：《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笔者赞同这一观点。关于鄱阳湖区域史，许怀林讨论了不同时期鄱阳湖流域的经济开发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在研究方法上颇具借鉴意义。（参见许怀林等：《鄱阳湖流域生态环境的历史考察》，南昌：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 年）梁洪生注意到 20 世纪中期以来鄱阳湖区渔业生产环境和秩序的剧变及渔业资源争夺问题，分析了湖区谱系“渔民化”的深层原因，加深了笔者对鄱阳湖区域社会变迁的理解。（参见梁洪生：《从“四林外”到大房：鄱阳湖区张氏谱系的建构及其“渔民化”结局——兼论民国地方史料的有效性及“短时段”分析问题》，《近代史研究》2010 年第 2 期）万振凡、周声柱对清以来鄱阳湖地区年深日久、错综复杂的民间纠纷进行了考察，揭示了历史上人们处理

一、20 世纪下半叶“农进渔退”进程

渔业是鄱阳湖区的传统产业。东晋陶渊明《游斜川序》生动再现了鄱阳湖渔业盛景：“鲂鲤跃鳞于将夕，水鸥乘和以翻飞。”王勃《滕王阁序》描述唐代鄱阳湖区渔民捕捞归航的动人画面：“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正因为渔业的发达和重要，元代就已设立河泊所征收渔课税。^①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饶州府征收的鱼课钞“属本府柴棚局河泊所办”，占总课税的37.13%。^②正德年间南康府杨林河泊所所征鱼课钞占各色课钞的35%以上。^③嘉靖年间九江府所属各色课钞约36577锭，^④鱼课钞计有17533锭，^⑤占课钞总数的47.93%。万历年间有闰年南昌府河泊所征收的鱼课银数共计1881.3两，无闰年南昌府辖五大河泊所征收的鱼课银数共计1737两，^⑥而当时南昌府所征商税才501两，^⑦远低于该府所征收的鱼课税。迨至清代，河泊所大多虽已裁革，但仍由各府县代管，课额照旧。渔业专项课税的征收，涉渔课税在地方税收中的高比重，延续至民国时期。^⑧可见，明清至民国时期渔业在鄱阳湖区域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

鄱阳湖区圩堤围垦的历史较长，早在东汉时，豫章郡太守张躬就在南昌城西南筑南塘湾堤以“捍江”。其附近的十二里堤，是唐刺史韦丹修筑的。^⑨元代余干县南汤圩的规模已达“数十里”。^⑩随着中原人口陆续南迁，鄱阳湖圩堤围垦到明代有了进一步发展，圩堤在鄱阳湖区域已经变得相当普遍，特别是赣江、信江、抚河、饶河和修水等下游入湖地带，其中以余干、鄱阳、南昌和新建4县为最多。经历明末战争，人口急剧减少，到清康熙乾隆时期，中国出现新一轮人

鄱阳湖地区民间纠纷的三大历史惯性。（参见万振凡、周声柱：《清以来鄱阳湖区民间纠纷处理的历史惯性——以都昌、鄱阳两县为中心》，《南昌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该文对笔者的研究有重要启示。学界关于渔业史研究起步较早但论著并不多，尹玲玲深入讨论了明清长江中下游渔业，但并没有涉及渔农两大产业关系。（参见尹玲玲：《明清长江中下游渔业经济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04年）学界尚未见从产业转化角度研究区域史的相关成果问世。本文中农业主要指水稻种植业，渔业没有特别说明的均指捕捞渔业。

- ① 《元史》卷89《百官志五》，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标点本，第2261页。
- ② 参见正德《饶州府志》卷1《税课》，《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958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84年影印本，第120页。
- ③ 参见正德《南康府志》卷5《课程》，《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64年景印本，第3页b—第4页a。
- ④ 嘉靖《九江府志》卷4《食货志·职贡》，《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62年景印本，第5页a。（由于本文资料出处不一，因此全文度量衡未作统一。——编者注）
- ⑤ 参见尹玲玲：《明代江西鄱阳地区的渔业经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2期。
- ⑥ 万历《新修南昌府志》卷9《典制类·渔课》，《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169页b—170页a。
- ⑦ 万历《江西省大志》卷1《赋书》，《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779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89年影印本，第3页b。
- ⑧ 参见吴贻：《渔业与鄱阳湖区域社会变迁（1912—1949）——以余干县瑞洪为中心的考察》，《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农进渔退”：明清以来鄱阳湖区经济、生态与社会变迁的历史内涵》，《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
- ⑨ 万历《新修南昌府志》卷6《水利》，《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第104页a。
- ⑩ 同治《余干县志》卷18《艺文》，《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257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影印本，第1335页。

口增长,鄱阳湖区域人口增长迅速,占江西总人口的比例越来越高,清代鄱阳湖圩堤围垦迎来一个快速发展时期。明清时期圩堤围垦推动了湖区农业发展,与渔业一起共同使鄱阳湖区成为全国著名的“鱼米之乡”,江西与湖广一起使“天下足”。民国时期,鄱阳湖区圩堤围垦经历一个缓慢的发展过程。历经上百年的动荡,终于在1949年迎来新中国,民众要求稳定和发展的愿望越来越强烈,新政府顺应了这一历史潮流,但由于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低,国家只能通过不断地大规模扩大耕地面积来满足民众愿望。鄱阳湖区就是通过圩堤围垦、提高粮食总产量来满足民众生存和整体社会发展需要的。

20世纪下半叶鄱阳湖区圩堤围垦快速发展,出现明显的农进渔退,大致分为两个阶段。1949—1957年是农进渔退快速发展的第一阶段,主要标志是出现大型国营垦殖场、农场。大量渔场让位于农田,农业产值增长,渔业的比重持续下降。1949年9月6日,江西省政府发出“组织群众修堤防汛和冬耕生产”的指示,要求“今冬明春将一切可能修复的圩堤全部修复”。^①湖区通过联圩并垸将散乱的小圩联并成为大型圩堤。1953年春余干县完成堵塞互惠河联圩方案,缩短堤线135.26公里,占原有堤线的72.3%,该县防洪排水条件因此大为改善,大米增产1220万斤。^②工程实施过程中,余干县七区乌泥的民工修筑圩堤的积极性很高。^③这也预示着鄱阳湖区即将迎来新的历史。随着土地改革的推进,鄱阳湖区逐步实现“耕者有其田”,粮食增产丰收有了可能,然而历史的进程充满曲折。1950年全省增产稻谷8610万斤,^④与年初增产5亿斤稻谷的计划^⑤有很大差距,仅完成计划的17.22%。1951年的情况更差,粮食总产量85.68亿斤,比上年减少4.6%。^⑥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1950年开荒43.13万亩,增产粮食6450万斤,^⑦于是政府与民众均把注意力转向鄱阳湖湖滩草洲。1954年9月4日,中南行政委员会下面成立湘鄂赣蓄洪垦殖委员会,确立了“蓄洪第一、垦殖第二、国营为主、民营为辅”的方针,全权负责江西、湖北和湖南三省的蓄洪垦殖。^⑧1954年9月江西省在报告中指出:“湖田除堤防决口及特大渍水年份外,平均每四年可丰收三年……拟充分利用滨湖低地湖泊”。^⑨11月湘鄂赣蓄洪垦殖委员会计划增加垦殖面积20余万亩。^⑩是月中旬开工的乐丰农场水利工程,位于鄱阳、万年、余干三县交界处,包括乐丰、珠湖两大国营农场,总面积近14万亩。^⑪全部工程最终于1955年5月完成。饶河联圩、红旗联圩、蒋巷联圩等相继建成,鄱阳湖区围垦建起了饶丰、赤湖、药湖、恒丰和成新等国营垦殖场。

1949—1957年鄱阳湖区新增围垦面积150平方千米,1958—1976年新增围垦面积约1060平

① 《江西省人民政府发出指示组织群众修堤防汛领导进行冬耕生产》,《江西日报》1949年9月6日。

② 江西省水利厅编:《江西省水利志》,南昌: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第71页。

③ 《信河下游联圩排水工程完成四成,永安闸即将施工》,《江西日报》1952年12月28日。

④ 李国强、何友良主编:《当代江西五十年》,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3页。

⑤ 李国强、何友良主编:《当代江西五十年》,第15页。

⑥ 李国强、何友良主编:《当代江西五十年》,第40页。

⑦ 李国强、何友良主编:《当代江西五十年》,第23页。

⑧ 《湘鄂赣蓄洪垦殖委员会组织条例(修正草案)》,1954年11月,卷宗号:X035—4—680,江西省档案馆。

⑨ 《江西省对治理鄱阳湖的初步意见》,1954年9月,卷宗号:X035—3—186,江西省档案馆。

⑩ 《关于长江防洪蓄洪排渍的几个(重要)问题》,1954年11月,卷宗号:X035—4—680,江西省档案馆。

⑪ 《我省筹办的第一所机械化农场乐丰农场开始动工兴建》,《江西日报》1952年11月15日;《国营乐丰机械农场修堤工程正式开工》,《江西日报》1952年12月17日。

方千米,^① 此为第二阶段,是圩堤围垦的高潮阶段。1958年5月,中国共产党八大二次会议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江西掀起“向湖要粮”、“与水争地”的圩堤围垦热潮。由于圩堤围垦区过快发展,导致劳动力严重不足,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有鉴于此,江西计划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调整60—70万劳动力去国营综合垦殖场;^② 出台了吸收退伍军人家属和未能升学的初中、高小毕业生为垦殖场劳动力的政策;^③ 1957年江西有5万干部进入垦殖场和农场工作。^④ 充实垦殖场或农场劳动力的工作一直在进行,有的地方从领导机关抽调40%—50%的干部到基层大办农业。^⑤ 1961—1965年,江西省一直致力于下放机关人员,以充实农业生产劳动力,并全力进行圩堤围垦。有地方甚至把城市周边的村庄整体搬迁去围垦区,如余干县城琵琶洲吴家村就是1966年被整体搬迁至鄱阳湖东塘圩内垦殖的。^⑥ 1960年9月28日《江西日报》社论指出,组成垦荒大军,开垦湖田洲地是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重要措施。^⑦ 《江西日报》时常刊登文章表扬鄱阳湖区的圩堤围垦,如《把一切能利用的土地尽量种上,波阳大垦湖洲扩种晚稻》和《为了增加一个余干县,余干县一九六〇年开发利用湖田洲地的情况的调查》等。^⑧ 1966年5月23日,江西省人民委员会批复上饶专署,同意兴建江西单体最大的圩堤围垦——余干县康山大堤围垦工程,^⑨ 鄱阳湖因之被围的面积高达36.7万亩。^⑩ 如此大规模的圩堤围垦在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也是罕见的,此乃农进渔退的典型案列。

快速的圩堤围垦确实使江西全省耕地面积大幅增加。有资料显示,江西全省湖田面积1958年是1957年的两倍多,1959年、1960年均比1957年增加近一倍;江西全省洲地面积1958年、1959年和1960年均是1957年的5倍左右。^⑪ 如鄱阳县滨湖垦区耕地面积占该县耕地面积的36.4%,而粮食产量却占总产量的80%;南昌县的耕地大部分都在圩堤围垦区,1984年全县粮食产量高达14亿余斤。^⑫ 湖田、洲田面积的大幅度增加表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鄱阳湖区出现了明显的农进渔退;同时,湖区农业经济的地位也得到大大提高,对当地农业的发展,

- ① 参见吴贻:《“农进渔退”:明清以来鄱阳湖区经济、生态与社会变迁》,博士学位论文,上海师范大学,2011年,第3章第1节。需要说明的是20世纪下半叶鄱阳湖区明显的农进渔退,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奠定了基本格局,此后的农进渔退是其历史延续。
- ② 《关于适当调整全省人口问题的决定》,1958年5月29日,卷宗号:X035—6—517,江西省档案馆。
- ③ 《关于参加综合垦殖场劳动生产的退役军人和新吸收人员工资福利问题的规定》,1958年5月29日,卷宗号:X035—6—509,江西省档案馆。
- ④ 《关于在波阳湖地区建立农场筹备情况向省委的报告》,1961年,卷宗号:X098—1—263,江西省档案馆。
- ⑤ 《要有这样的狠心抓农业抓粮食》,《江西日报》1960年8月12日。
- ⑥ 《下乡插队插场人员名册》,1966年8月,卷宗号:1026—8—3,余干县档案馆;余干《琵琶洲吴氏宗谱》,1999年。
- ⑦ 《向辽阔的湖田洲地进军》,《江西日报》1960年9月28日。
- ⑧ 《赣北力促湖洲作物早熟高产丰收,派遣远征军大闹湖洲田间管理》,《江西日报》1960年2月12日;《把一切能利用的土地尽量种上,波阳大垦湖洲扩种晚稻》,《江西日报》1960年7月23日;《向湖田洲地索取更多的粮食,波阳、都昌、分宜数万劳动大军大战湖洲抢种秋作物》,《江西日报》1960年8月19日;《为了增加一个余干县,余干县一九六〇年开发利用湖田洲地的情况的调查》,《江西日报》1960年10月11日;《扩大冬种面积争取明春多收,鄱阳湖滨社员积极开垦湖田洲地》,《江西日报》1961年10月30日。
- ⑨ 《关于康山防洪、灭病围垦综合工程设计任务书的批复》,1966年10月,卷宗号:X036—1—570,江西省档案馆。
- ⑩ 《鄱阳湖研究》编委会:《鄱阳湖研究》,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第267页。
- ⑪ 参见《江西省统计局1957—1962农业历史资料》,1963年12月,卷宗号:041—1—015,江西省档案馆。
- ⑫ 江西师范大学地理系课题组:《鄱阳湖区围垦的综合评价》,1986年,第36页。

特别是湖区人民的重大生计，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农业主体地位的确立

鄱阳湖区增加的湖田、洲地绝大部分是圩堤围垦的结果，主要集中在余干、南昌、进贤和鄱阳4县，其中余干和南昌是国家商品粮基地县。1976—1984年上述4县累计生产的商品粮占湖区的75.51%，1949年后的三十多年里，鄱阳湖区除南昌市、九江市外，每年向国家提供商品粮6.92亿公斤。^①鄱阳湖区为我国粮食供应和粮食安全作出了巨大贡献，也因此成为我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直接推动江西成为农业大省。

圩堤围垦无疑加速了农进渔退的进程，农业在经济中的重要性迅速上升。1984年，鄱阳湖区的农业总产值中，水稻种植产值占52.63%，而渔业总产值只占4.0%。^②本文讨论的捕捞渔业所占比重则更低。农业在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得以确立，成为湖区人民最大的生活依靠。

大规模农进渔退之前，余干县瑞洪西岗是个典型的渔村。1957年，西岗拥有大批渔业捕捞工具，如渔船487艘、高网15部、嫩网32部及大量的其他渔具。当时西岗渔村拥有大面积水域，而只有极少量的水田。资料显示，民国时期西岗村有480余户，2400余人，仅有水田40亩。^③1957年西岗村总收入计划为263557.51元，其中渔业计划收入159058元，占计划总收入的60.4%，农业计划收入为99212元，占计划总收入的37.6%；总支出计划为67974.40元，其中渔业计划投资21311.91元，占计划总支出的31.35%，农业计划投资14304.42元，占计划总支出的21.04%。^④无论从计划收入还是支出来看，当时西岗的农业都处于次要地位。全村的主要收入来自渔业，粮食基本依靠外供。但农进渔退改变了西岗等鄱阳湖区渔村的经营结构，这种变化可从1966年前后西岗村拥有的水田面积中看出（详见表1）。

表1 1966年前后西岗村拥有水田面积

（单位：亩）

年 份	1962	1963	1964	1965	1966	1971
水田面积	27.2	26.23	29	30.50	30.50	4230

资料来源：新生大队农业生产计划统计，1962年4月，卷宗号：2037—3—17；1963年12月14日，卷宗号：2037—3—4；1966年1月，卷宗号：2037—4—9；1966年2月1日，卷宗号：2037—5—4；1967年12月，卷宗号：2037—6—12；1971年10月，卷宗号：2037—6—1，余干县档案馆。

注：西岗村1949年改名为新生，1984年改回西岗村。

从表1可知，1966年是西岗村历史上的重要时间节点。康山大堤的兴筑使鄱阳湖大片水面变农田，西岗渔村获得多达4000余亩的大片水田，其发展轨迹随之改变。西岗渔村粮食从此不再仰需于外，而且还能出售不少商品粮。西岗由典型渔村嬗变为农业大村，渔民转变为农民。

鄱阳湖区另一个著名渔村是余干县大塘。新中国成立之初，大塘只有少量水田。在各地圩堤围垦的带动下，截至1966年大塘也通过圩堤围垦开发出一千多亩水田。1962年大塘共有水田

① 《鄱阳湖研究》编委会：《鄱阳湖研究》，第219、4页。

② 《鄱阳湖研究》编委会：《鄱阳湖研究》，第5页。

③ 张继良（余干西岗村人）：《残丝随笔》，未刊稿，打印本，2004年，第4页。

④ 《余干县新生乡新生渔业（高级）生产合作社半年来办社的纪实》，1957年1月27日，卷宗号：2005—6—33，余干县档案馆。

1338 亩,^① 1963 年集体所有水田 1265 亩,^② 1964 年拥有水田 1300 亩,^③ 这三个数据说明 1966 年之前大塘拥有的水田面积在 1300 亩上下。1966 年康山大堤兴建,大塘在 1967 年计划扩种水稻面积 4000 亩。^④ 因为大塘水域较深,没有像西岗渔村那样很快就获得大片水田,而是在圩堤围垦配套工程竣工后的 1969 年才获得 4000 亩水田。此后,大塘渔村逐步进行圩堤围垦,2003 年拥有水田 5500 亩之多。^⑤ “三百里鄱湖,随水打鱼”的典型渔村大塘嬗变成农业大村。

农进渔退、农业主体地位的确立,推动渔村变成农村,渔民变成农民。鄱阳湖区渔村在 20 世纪下半叶都经历了类似的发展历程,如余干县东源、康山、严溪渡、下岸詹家和院前等,鄱阳县莲湖、长山和古县渡等,星子县的蓼花池、板桥和蓼南等,永修县的吴城和九合等,以及都昌县的多宝、余晃和芡溪等。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余干县“共有专业渔民 1196 户 2501 人,兼业渔民 1919 户 3839 人”,^⑥ 与民国 25 年(1936)相比,^⑦ 专业渔民减少很多,兼业渔民减少一半以上。这种现象在鄱阳湖区普遍存在,如星子县板桥张氏和鄱阳县铺前等。

总之,农进渔退推动鄱阳湖区成为重要的商品粮产地,绝大部分渔民变成了农民,支撑渔业的水域迅速缩小,渔业衰退,在区域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小。这无疑是重大的生产结构转型。

三、渔业的快速衰退

鄱阳湖区渔业的快速衰退,主要表现在渔业捕捞量和渔获物的质量下降,鱼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产卵场、育肥场遭到破坏,优质捕捞区域相继被围垦。其中捕捞量的下降是渔业衰退的直接表现(见图 1)。

图 1 显示 1964—1968 年鄱阳湖区余干、南昌和新建 3 县渔业捕捞量呈明显下降趋势。此时鄱阳湖区正处于圩堤围垦的高潮。这也可从鄱阳湖区周边 3 个地市有关数据得到验证(见图 2)。

从图 2 可以看出,1965—1968 年上饶地区、南昌市和九江市水产品捕捞量出现明显下降。图 1 和图 2 的数据表明,1965—1968 年鄱阳湖区渔业出现明显衰退。其实鄱阳湖区渔业自 1966 年开始的 13 年中已经出现迅速衰退,每年平均递减 2.0%。^⑧ 1950 年后的 35 年间,鄱阳湖区捕捞量由 50 年代前期的 1.91 万吨降至 80 年代中期的 1.36 万吨。^⑨ 其中,余干县年均渔业捕捞量在 20 世纪 60 年代前半期开始下降,是因为当时鄱阳湖区经由圩堤围垦成立了诸多大型国营垦殖场;60 年代后半期年均渔业捕捞量突然降到 1777.2 吨,仅是其前半期的一半,因为此时鄱阳湖区圩堤围垦处于高潮,如 1966 年底江西省兴建了最大的单体圩堤围垦——余干县康山大堤围垦

① 《中共余干大塘公社委员会、余干县大塘公社管理委员会关于一九六二年农业生产计划的十项措施》,1962 年 2 月 30 日,卷宗号:2042—5—4,余干县档案馆。

② 《大塘公社农业生产统计年报(1963)》,1963 年 12 月,卷宗号:2042—6—4,余干县档案馆。

③ 《关于兴建圩堤扩大面积需要解决建闸经费的请示报告》,1964 年 12 月 14 日,卷宗号:2042—7—4,余干县档案馆。

④ 《关于请示解决稻种与定量指标的情况报告》,1967 年 3 月 12 日,卷宗号:2042—10—1,余干县档案馆。

⑤ 吴三友,大塘人,55 岁,现任大塘村书记,其祖辈、父辈均为专业渔民,2011 年 6 月 5 日采访笔记、录音。

⑥ 何焕荣:《余干渔业生产简况》,政协余干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余干县文史资料》(第 14 辑),内部资料,1998 年,第 25 页。

⑦ 江西《经济旬刊》(1937 年第 9 卷第 1 期)记载:余干有专业渔户 1500 户 3000 人,副业渔民 4000 户 8000 人。

⑧ 《鄱阳湖研究》编委会:《鄱阳湖研究》,第 223 页。

⑨ 《鄱阳湖研究》编委会:《鄱阳湖研究》,第 269 页。

工程，鄱阳湖面因之缩小了8%，库容量亦相应地减少了18亿立方米。^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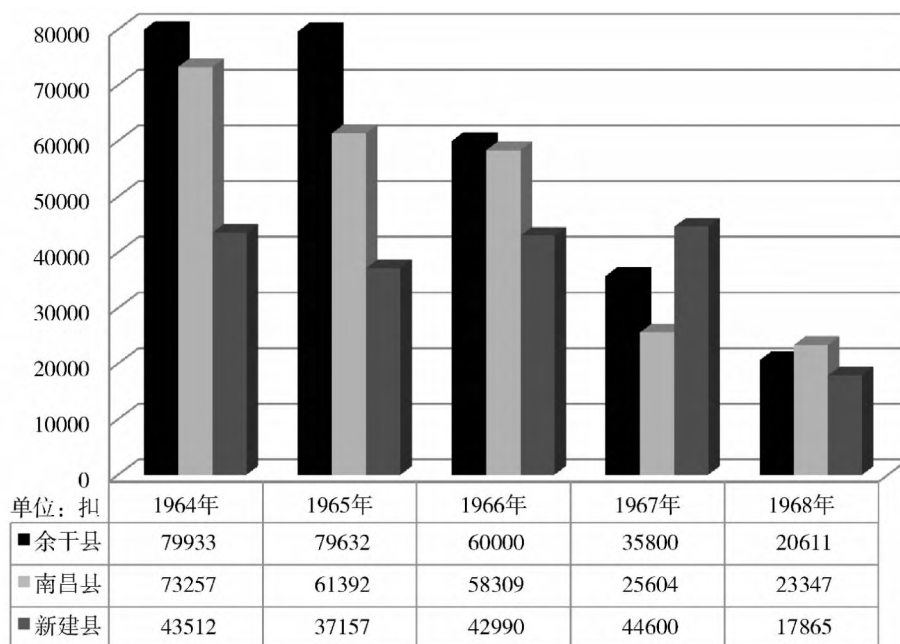


图1 鄱阳湖区部分县1964—1968年渔业捕捞量变化图

资料来源：江西省农业局水产处：《渔业统计资料》，内部资料，1976年，第213—21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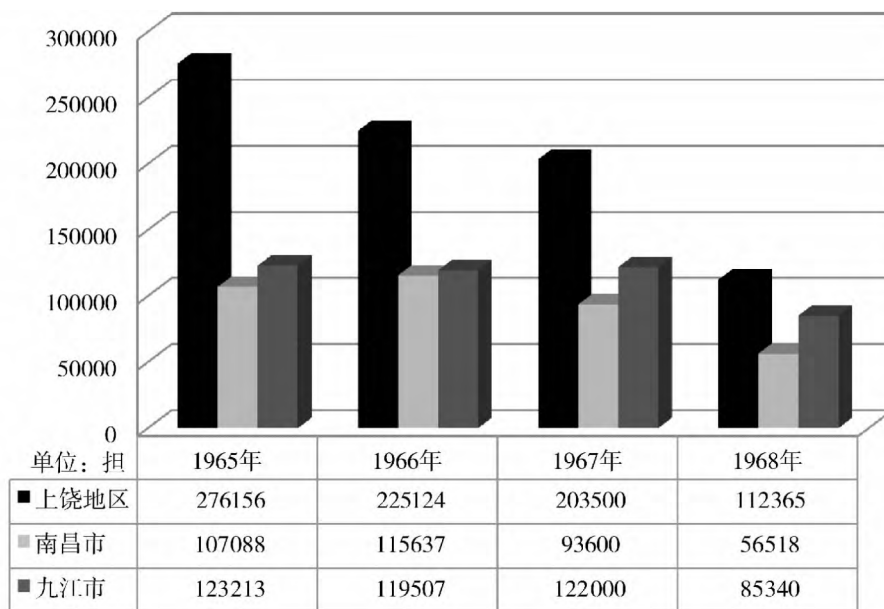


图2 江西省部分地市1965—1968年水产品捕捞量变化图

资料来源：江西省农业局水产处：《渔业统计资料》，第109页。

渔获物的低龄化和个体小型化情况越来越严重，是渔业衰退的又一个突出表现（见表2）。

^① 《鄱阳湖研究》编委会：《鄱阳湖研究》，第267页。

表2 鄱阳湖渔获物中鲤鱼个体年龄结构

(单位: %)

年 份 \ 年 龄	0	1	2	3	4	5	6	7	8
1963			66.6	20.1	8.3	3.4	1.2	0.2	0.2
1974	1.1	14.6	59.7	15.9	5.7	1.4	1.6		
1984	25.3	37.6	24.5	9.4	2.1	1.1			

资料来源:《鄱阳湖研究》编委会:《鄱阳湖研究》,第269页。

表2显示,1963年至1984年,鄱阳湖渔获物中鲤鱼年龄越来越小,意味着个体也越来越小,并且这种形势越来越严重。正如专业人士所担忧的,“当前鱼的规格变小这一苗头,已不是好的预兆”。^①而鲤鱼和鲫鱼是鄱阳湖的优势鱼种,其产量约占鄱阳湖渔业总产量的一半左右。^②有理由认为,1963年至1984年鄱阳湖鱼类中低龄个体比例迅速增大,渔获物的低龄化和个体小型化情况越来越严重。银鱼、鲥鱼和鲢鱼等鄱阳湖区珍贵鱼类濒临灭绝,这也表明渔业资源有枯竭的危险。

渔业衰退的第三个突出表现是鱼类产卵场育肥场遭到破坏和优质捕捞区域被围垦。鄱阳湖区适宜圩堤围垦的区域主要集中于鱼类产卵育肥的湖滩草洲。1954年至1961年鄱阳湖被围垦的鱼类天然产卵育肥场地共有9处,约减少面积16万亩。鄱阳湖区共有680个垸湖,面积可达195万多亩,均是良好的捕捞场所;1954年至1961年被围垦的垸湖多达105个,缩小捕捞面积45万多亩,常年捕捞量因此减少了480多万斤。^③1959年到1961年,鄱阳湖区圩堤围垦时就提出过要保护37处、面积达78万亩适宜鲤鱼产卵的优质湖滩草洲,但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研究所1965年调查时,鄱阳湖区只有24处、面积计31万亩鲤鱼产卵的优质湖滩草洲。^④1973年江西省水产部门调查时发现,鄱阳湖南部24处优质鲤鱼产卵场又有6处被圩堤围垦,重新评估后确定新的鲤鱼产卵优质湖滩草洲有23处,面积约计26万亩。^⑤上述数据表明,1961年至1973年13年中,鄱阳湖区鲤鱼产卵优质湖滩草洲的面积由原来的78万亩降至26万亩,即面积减少67%。这表明圩堤围垦对渔业衰退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影响。

鄱阳湖区渔业衰退的同时,长江中下游地区其他类似的大江、大河、大湖区域亦普遍面临同样的局面。这点一再为许多研究者所认同。安庆境内湖泊众多,渔业资源丰富,是安徽省淡水鱼主产区,新中国成立初期年捕鱼量在3000万公斤左右。但20世纪50年代后期,这里也开始圩堤围垦。20世纪70年代末,全区围垦湖泊面积7.73万公顷,占湖泊总面积的1/3以上,有的湖泊被围垦殆尽从此消失。渔业产量急剧下降,20世纪60年代中期年均鱼产量仅有1100万公斤,并且所捕鱼的个体明显变小,鱼的质量亦明显变劣。同处安庆境内而位于长江以南的升金湖,原来是过水型通江湖泊,鱼产丰富,素有“日产升金”之说,但圩堤围垦改变了其历史。自1965年开始先后围湖造田66平方千米,湖泊面积缩小了40%,从而使鱼产量大幅度减

① 《水产与围垦的关系调查报告》,1963年12月12日,卷宗号:X106—1—210,江西省档案馆。

② 《鄱阳湖研究》编委会:《鄱阳湖研究》,第271页。

③ 鄱阳湖区综合调查组:《鄱阳湖综合调查报告》(铅印本),1963年,第30—33页。参见《鄱阳湖研究》编委会:《鄱阳湖研究》,第271页。

④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研究所:《鄱阳湖南部鲤鱼产卵场综合调查研究》(油印本),1965年。参见《鄱阳湖研究》编委会:《鄱阳湖研究》,第271页。

⑤ 江西省农业局水产资源调查队等:《鄱阳湖南部鲤鱼产卵场变迁情况调查报告》,《江西水产科技》1974年第2期。

少,由1954年的300万公斤减至50万公斤。^①湖北省洪湖鱼类的种类由20世纪40年代的100余种下降到50余种,鱼类产量下降且个体越来越小。^②洞庭湖渔业产量因为围垦而下降。20世纪50年代洞庭湖湿地区域天然渔场的捕捞量为61.4万担,60年代为49.7万担,70年代下降到32.2万担,六七十年代捕捞量较50年代分别下降了18.89%、47.56%。^③鱼的种类和种群数量都减少了,鱼越来越难捕到,捕捞强度随之渐趋加大,造成过度捕捞。伴随鱼产量下降的是鱼的个体变小和鱼类种群的衰退。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鄱阳湖区渔、农两大产业开始发生剧烈变动。那么,为什么会在此时出现明显的农进渔退呢?

四、动力机制分析

显然,农进渔退现象具有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特定历史背景与客观原因,但具体到鄱阳湖区而言,20世纪50年代初,鄱阳湖滨及赣江、抚河、信江和饶河等河流下游湖滩草洲广布,便于圩堤围垦,则是渔退农进的可能性条件。鄱阳湖的水位有明显的季节性,具有“洪水一片,枯水一线”、“高水是湖,低水似河”的独特景观,呈现湖滩草洲连片和小湖星罗棋布景象。这些分布在五河入湖三角洲地区的湖滩、草洲,地势平坦,土质肥沃,具有便于开垦利用的价值。因此,湖区民众早就利用湖滩草洲从事种植活动,进而移民耕垦。鄱阳湖有“季节性”和“吞吐型”的特征,湖滩草洲地区屡遭洪涝灾害。民众为摆脱“种得喜,收得愁,三年两歉收”困境,采取圩堤围垦来替代原来不围而垦的生产方式。

人口增长是鄱阳湖区农进渔退的必要性条件。人口增长^④能够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人力资源方面的保障,但人口剧增,粮食需求迅速增长,对耕地要求日益迫切,这在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下尤为突出。在人、田矛盾突出的历史背景下,人口增长成为鄱阳湖农进渔退的必要条件。1950年湖区人口为2526912人,1985年已增加到5641165人,35年间人口净增3114253人,增加了123%,高于江西全省同期增长水平。1962—1982年,鄱阳湖区人口年均增长率为2.87%,高于全省水平。湖区人口密度从1953年的每平方公里134人增加到1962年的169人,1982年又猛增到273人,远高于江西全省199人的人口密度。^⑤1999年湖区人口为649.9万人,比1978年增加了26.94%,净增人口137.86万人。^⑥随着人口迅速增加,粮食需求量自然越来越大,在当时只能靠扩大耕地面积来满足需求。事实上,农进渔退的确满足了当时的需求。当然,人口增长又为圩堤围垦提供了足够的人力资源。

稻田比水面的经济价值大,是鄱阳湖区农进渔退的基本动因。^⑦1957—1984年鄱阳湖区农

① 陶思明:《湿地生态与保护》,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67—68页。

② 姜文来、袁军编著:《湿地》,北京:气象出版社,2004年,第143页。

③ 袁正科主编:《洞庭湖湿地资源与环境》,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70—371页。

④ 人口增长包含自然增长和非自然增长。非自然增长是指为垦殖湖区而从其他地区迁移而来的劳动力。所以人口增长是个广义概念。湖区人口增长与对粮食需求的生长,是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人口增长这一必要条件,还与全国人口增长及粮食供给不足相关。

⑤ 《鄱阳湖研究》编委会:《鄱阳湖研究》,第277、5页。

⑥ 邹秀清:《鄱阳湖区农业自然资源利用演变机制研究》,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88页。

⑦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下水稻种植业是重中之重,实际上是不鼓励其他产业(副业)发展的,水稻种植收入高于渔业养殖收入,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采取精养的方式,渔业养殖收入可能高于水稻种植业。

业、渔业尚处于粗放经营状态,从投入与产出比来看,当时稻田无疑比水面更具有经济价值。有研究表明,1949年鄱阳湖的面积为5050平方千米,1957年、1960年、1965年和1967年的各时间段鄱阳湖分别被围垦150平方千米、310平方千米、260平方千米和370平方千米,^①相应地,鄱阳湖的面积为4900平方千米、4590平方千米、4330平方千米和3960平方千米。另据江西省农业局水产处1976年编纂的《渔业统计资料》显示,1957年、1960年、1965年和1967年鄱阳湖区渔业捕捞量分别为444716担、449236担、432536担和362118担。^②据此可以估算出1957年、1960年、1965年和1967年鄱阳湖区渔业捕捞量的亩产分别是3.025公斤、3.26公斤、3.33公斤和3.05公斤,即1957—1967年若干年份鄱阳湖区渔业捕捞平均亩产数约为3.166公斤。而鄱阳湖区渔业综合价格为0.42元/公斤,^③可知当时鄱阳湖区渔业捕捞亩产产值约为1.33元,即使以1957—1984年的鄱阳湖区渔业综合价格0.71元/公斤来计算,当时渔业捕捞亩产产值也只有2.25元。

农进渔退,湖区有了大型圩堤的保障,民众逐渐在围垦内湖水面上开展湖泊、河沟养鱼,围垦区内部分区域由于水深暂时没有开垦成田而成为水库,亦成了养鱼之所。1958年,全省垦区水产养殖面积21.24万亩,1960年扩大到34万亩。1990年,养殖面积在千亩以上的垦殖场有饶丰、鸦鹊湖、铁河、恒丰、五星、共青和赛湖等15个,其中鸦鹊湖垦殖场可供养殖的水面有4000亩,饶丰垦殖场有4053亩,五星垦殖场有5453亩。^④因此,有必要对水稻种植业和湖泊、河沟和水库养鱼业的亩产及其成本进行比较。1957—1984年若干年份江西省湖泊、河沟和水库养鱼亩产数如表3。

表3 1957—1984年若干年份江西省湖泊、河沟和水库养鱼亩产数 (单位:公斤)

年 份	1957	1974	1975	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湖泊养鱼	15.76	6.50	12.60	9.20	9.63	11.00	10.50	10.00	14.50	16.00
河沟养鱼					7.8	23.8	15.8	23.6	31.6	34.5
水库养鱼		4.3	12.1	14.5	10.0	10.5	11.0	13.0	14.0	15.0

资料来源:《江西省农牧渔业志》编纂委员会编:《江西省农牧渔业志》,合肥:黄山书社,1999年,第622、623、625页。

表3显示,1957—1984年若干年份江西省湖泊养鱼平均亩产数为11.57公斤,同时期江西渔业主产区即鄱阳湖区渔业综合价格为0.71元/公斤,^⑤可知当时湖泊养鱼亩产产值约为8.21元。1979—1984年江西省河沟养鱼平均亩产数为22.85公斤,同时期鄱阳湖区渔业综合价格为0.83元/公斤,^⑥可以推算出当时河沟养鱼亩产产值约为18.97元。1974—1984年江西省若干年份水库养鱼平均亩产数为11.6公斤,同时期鄱阳湖区渔业综合价格为0.75元/公斤,^⑦因此当时水库养鱼亩产产值约为8.7元。

既然要比较稻田与水面单位产值,那么接下来就得考察同时期的稻田亩产产值。1957—

① 参见吴贇:《“农进渔退”:明清以来鄱阳湖区经济、生态与社会变迁》,第3章第1节。

② 江西省农业局水产处:《渔业统计资料》,第212—213页。

③ 《江西省物价志》编纂委员会编:《江西省物价志》,北京:方志出版社,2003年,第126页。

④ 《江西省农垦志》编纂委员会编:《江西省农垦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8年,第98、204、205页。

⑤ 《江西省物价志》编纂委员会编:《江西省物价志》,第126页。

⑥ 《江西省物价志》编纂委员会编:《江西省物价志》,第126页。

⑦ 《江西省物价志》编纂委员会编:《江西省物价志》,第126页。

1984年若干年江西省水稻亩产数见表4。

表4 1957—1984年若干年份鄱阳湖区稻谷亩产数

(单位:公斤)

年份	1957	1966	1976	1979	1982	1984
亩产	143.7	168.5	199.5	247.5	276.5	300.5

资料来源:《鄱阳湖研究》编委会:《鄱阳湖研究》,第221页。

表4显示,1957—1984年若干年份鄱阳湖区稻谷平均亩产数为222.7公斤。而同时期江西省标准品粮食收购价格为0.22元/公斤,^①因此当时水稻种植亩产产值约为48.99元。

据上述分析可知,鄱阳湖区湖泊、河沟和水库养鱼的亩产产值分别约为8.21元、18.97元和8.7元,渔业捕捞亩产产值约为1.33元,而同时期水稻种植亩产产值约为48.99元,从亩产产值来看,渔业远低于水稻种植业,即稻田比水面单位产值高。粗放经营状态下,养鱼业的饲料主要是青饲料,包括水生植物如金鱼藻和菱角叶等,陆生植物如狗尾草和野茼蒿等,^②所需要的劳力与水稻种植业采集草肥相当。笔者在调研中得知,养鱼业中的鱼苗成本略高于水稻种植业的种子费用,而所需劳力成本则稍低于水稻种植业,总体而言水稻种植业的成本略高于养鱼业。^③在粗放经营状态下,从投入与产出比来看,水稻种植比养鱼的经济效益大得多。因此,稻田无疑比水面更具经济价值。这是圩堤围垦、农进渔退的基本动因。

上述因素,主要是人为因素,^④它们推动鄱阳湖区在20世纪下半叶出现明显的农进渔退。从中不难发现,生计所需使之成为一种历史必然。这也是大江、大河、大湖区域的历史共性。不消说,鄱阳湖区的发展,离不开新中国的整体发展格局及相关方针、制度与政策。这方面的情况,是各类国史论著所充分阐述过的,无须赘述。笔者要强调的是,鄱阳湖区的自然与人文条件,与新中国不同时期的整体发展政策,都具有完整的契合性。

五、农进渔退的生态影响

圩堤围垦曾在很长时期内为促进湖区农业发展,推动区域社会进步发挥过重要作用。因此,不能对之简单否定。但圩堤围垦的快速发展,鄱阳湖被围垦1210平方千米,水面比20世纪50年代初期萎缩近1/4,湖区生态系统逆向演化,水灾频发并加剧,生物多样性遭到破坏。这在强调绿色发展的今天,无疑更应予以总结。

① 《江西省物价志》编纂委员会编:《江西省物价志》,第46—47页。

② 《江西省农牧渔业志》编纂委员会编:《江西省农牧渔业志》,第631页。

③ 李汗辉,江西省余干县乌泥镇港背人,1977年高中毕业后长期担任会计,2013年9月8日采访录音;王旺凡,江西省余干县康山乡王家人,1978年高中毕业后长期担任会计,2014年6月6日采访录音。

④ 影响湖区盈缩变迁的还有自然力,相较于人为因素,自然条件的变化,例如气候的变化、泥沙的沉积、洪水的频度等等多属长时段的因素,它们与短时段的人为因素相结合,也在影响着湖区的进退。关于长时段自然力要素的研究,可参见闵騫、汪泽培:《鄱阳湖近600年洪水规律的分析》,《湖泊科学》1994年第4期;闵騫、汪泽培、倪培恩:《近40年鄱阳湖水位变化趋势》,《江西水利科技》1992年第4期;熊道光:《鄱阳湖泥沙来源及湖盆近期沉积规律探讨》,《海洋与湖沼》1990年第4期;郭家力、张志强、郭生练、洪兴骏、王乐:《气候变化对鄱阳湖水位变化的影响分析》,《水资源研究》2014年第6期;等等。

一个区域在生存、发展过程中必然会与其所处环境发生信息及能量的交换。鄱阳湖区生态系统大体可分为三个层次，湖区周边的县市是核心层次，中间层次为鄱阳湖流域，外围层次则为长江中下游地区乃至整个中国甚至更大的范围。三个层次互相作用。渔业、农业、生态构成鄱阳湖区社会生态系统的三个子系统，但就长江中下游地区而言，鄱阳湖区本身又成了大系统的一个子系统。鄱阳湖区虽然地处江西境内，但长江中下游地区每一次大变动均会在这里得到回应。因此，鄱阳湖区的渔业、农业、生态研究不是孤立的，局部与整体的关系也是相对的。渔业、农业、生态三个子系统互动的媒介主要是“农进渔退”。

15世纪至20世纪，鄱阳湖流域水灾渐趋频发、加剧。按笔者的统计，15—18世纪鄱阳湖流域发生1次水灾的时间间隔为10年，19世纪为每4.5年，20世纪上半叶为2.63年，下半叶则缩短至1.47年。15世纪鄱阳湖流域发生过3次特大水灾，16世纪4次，17世纪和18世纪均出现过5次，19世纪9次，20世纪则有12次之多。特大灾情的频率亦相应提高，15世纪发生一次特大水灾的时间间隔为33年，16世纪为25年，17、18世纪约为20年，19世纪为11年多，20世纪则缩短至8.3年。^① 20世纪下半叶水旱灾害突然增多，越发严重，连续灾害不断出现，甚至还出现过连续8年和10年的灾害，并且还有特大水旱灾害相连的情况。更为严峻的是，在1998年和1999年连续两年出现“世纪大水灾”。20世纪50年代开始，鄱阳湖流域基本上“水旱连年、无年不灾”，这与鄱阳湖区农进渔退的进程同步。灾害的强度愈来愈大，危害日趋严重。有关研究表明：1950—1997年的48年分为前后两个24年，1974—1997年的后24年中最高洪水位，平均都比1950—1973年的前24年高1.01米；最高洪水位超过19米、20米、21米的年数中，前24年占1/3，后24年是前者的两倍。^② 这也表明水灾日趋严重，愈来愈烈。比如，1950—1985年的30多年中余干县就有26年发生大水灾。^③ 这意味着鄱阳湖区不到1年半就有一次洪涝灾害发生。宋元时期长江中下游发生较大水灾的频率为每5年多1次，明清两代每4年多1次，20世纪上半叶每2.5年1次，而20世纪下半叶的频率则为1.4年1次。^④ 对照鄱阳湖区小系统与长江中下游大系统水灾的频率，可知两者之间非常接近，表明长江中下游大系统与鄱阳湖区小系统之间相互影响程度之深。小系统的破坏会影响大系统，反之亦然。

鄱阳湖在20世纪下半叶因为圩堤围垦、农进渔退而减少了80亿立方米的容量，^⑤ 洪峰水位因此被大大抬升。有研究表明，20世纪50年代长江中下游通江湖泊总面积约1万平方千米，但20世纪80年代初锐减至6600平方千米，近年来又有减少。^⑥ 进入20世纪下半叶，湖区发生洪涝灾害的频率显著上升，几乎年年都有大小洪涝灾害发生，其中灾情严重的年份有1949年、1954年、1962年、1973年、1983年、1992年、1995年、1998年和1999年。据统计，湖区多年平均遭受洪涝灾害的面积高达5.6万公顷，造成的经济损失越来越大。洪涝灾害成为制约鄱阳湖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1995年鄱阳湖大水，湖口水文站水位21.80米，比1954年的21.68米和1983年的21.71米还要高，廿四联圩等30多座圩堤溃决，受灾农田多达1.3万多公

① 姜红仁、吴贻：《“农进渔退”：清末以来鄱阳湖区水旱灾情的历史考察》，《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

② 闵騫：《鄱阳湖围垦对洪水影响的评价》，《人民长江》1999年第7期。

③ 余干县志编纂委员会：《余干县志》，北京：新华出版社，1991年，第163页。

④ 参见胡明思等主编：《中国历史大洪水》，北京：中国书店，1992年。

⑤ 闵騫：《鄱阳湖围垦的洪水位效应》，《环境与开发》1998年第2期。

⑥ 马逸麟、李均辉、宋宇：《江西省鄱阳湖区水患灾害特征及发展趋势分析》，《国土资源导刊》2004年第4期。

顷。1998年入夏之后,长江流域又发生了历史罕见的特大洪涝灾害。7月31日鄱阳湖湖口水文站水位已然高达22.58米,继1995年后再次超过历史最高水位,比1995年还要高0.78米,全省溃决了二百多座圩堤,农作物受淹面积158.44万公顷,成灾123.47万公顷,造成粮食减产21.2亿千克,直至9月上旬沿江滨湖地区仍有34万公顷农田浸泡在水中,江西全省直接经济损失高达380亿元。^①农进渔退大大改变了鄱阳湖区的水、陆分布,引发区域气温变化,进而影响蒸发量,加剧降水时空分布的不均,^②加大了水旱灾害发生的几率,最终导致水旱灾害渐趋频繁、严重,且水灾与旱灾相连的现象较为突出。

系统各个要素之间互相制约,其结构体系越复杂,彼此之间的互动越多,系统内部自动调节的能力就越强。就洪涝灾害角度而言,鄱阳湖与长江的关系主要表现为江湖水位的相互顶托。通常年份鄱阳湖区汛期为4至9月,4至6月为鄱阳湖五河的主汛期,7至9月为长江的主汛期,江湖的洪峰相互影响。长江水流倒灌是鄱阳湖发生洪涝灾害的重要原因。^③有研究表明:“如果长江干流下泄量一定,湖口出流量增加 $10000\text{m}^3\cdot\text{s}^{-1}$,武穴、九江中高水位将分别抬高1.0—1.3m。”^④鄱阳湖水流对长江流域湖口以上河段洪水具有比较明显的顶托作用。鄱阳湖具有调蓄长江洪水的功能。原来长江有一系列类似鄱阳湖这样具有调蓄洪水功能的湖泊,如洞庭湖、洪湖以及龙感湖等,但由于圩堤围垦,特别是20世纪下半叶,洞庭湖区乃至长江流域经历了与鄱阳湖区类似的明显的农进渔退历程。洞庭湖因淤积围垦面积减少1600平方千米,容量减少超过100亿立方米,几乎丧失了调蓄长江洪水的功能。如果用1954年的天然调蓄洪水的容积对1998年实际洪水量进行演算,洞庭湖、鄱阳湖及长江中游1998年的洪水水位可降低1米左右。^⑤这1米左右的水位,可以使多少民众免遭洪涝的涂炭,多少损失可以避免。鄱阳湖较好地保留了调蓄长江洪水的功能,当下其对长江洪水的调蓄作用十分明显,有研究表明,鄱阳湖调蓄作用占调蓄总量的82.6%。^⑥同理,长江对鄱阳湖洪水的调蓄作用亦愈来愈明显,长江与鄱阳湖一大一小两个系统间的关联性越来越强。对长江这个大系统而言,失去洞庭湖、洪湖以及龙感湖等具有调蓄洪水功能的湖泊,其结构变得简单,系统内部自动调节的能力趋弱,以致20世纪下半叶鄱阳湖区水旱灾害突然增加、严重。

一个系统的结构越复杂,其稳定性就越高,越能保持平衡。生物多样性会增加生态系统的稳定性。^⑦保护生物多样性对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意义特别重大。而当代人类的许多活动,比如鄱阳湖区的农进渔退,却破坏了湖区的生物多样性。这造成鄱阳湖生态环境的恶化,严重地影响了湖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农进渔退导致湖滩草洲面积减少,生物量下降,以及鄱阳湖湿地植被带完整性遭到破坏。随着农进渔退,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鄱阳湖区草洲面积减少的情况逐渐加剧。统计显示,1927年至1964年,鄱阳湖区草洲面积年均减少3.92平方千米;1964年至1988年的20多年中,年均减少7.23平方千米。^⑧据笔者多年调查,鄱阳湖藁草、芦苇和荻植

① 陈双溪主编:《江西'98特大洪涝气象分析与研究》,北京:气象出版社,2000年,第27、28、32页。
② 王怀清等:《近50年来鄱阳湖五大流域降水变化特征研究》,《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09年第7期。
③ 水灾频发既有圩堤围垦方面的原因,亦有降水过多上游来水过大方面的原因,如1998年大洪水即是如此。
④ 王兆印等:《长江流域水沙生态综合管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222页。
⑤ 姜文来、袁军编著:《湿地》,第65—66页。
⑥ 王圣瑞等编著:《鄱阳湖生态安全》,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172页。
⑦ Shahid Naeem and Shibin Li, "Biodiversity Enhances Ecosystem Reliability," *Nature*, vol. 390, no. 6659 (December 1997), pp. 507-509.
⑧ 王晓鸿主编:《鄱阳湖湿地生态系统评估》,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61页。

退化严重。20 世纪 60 年代初,鄱阳湖区有 119 种植物,但到 80 年代仅采集到 102 种,^① 20 年左右的时间减少了 17 种植物。与此同时,湿地植被带完整性亦遭到破坏,原来具有明显环带状分布的植被变得支离破碎。20 世纪 50 年代初,湿地洲滩上芦苇和荻群丛遍地皆是,但到 20 世纪 80 年代已大为减少,仅散见于藁草等群丛之中,环带状垂直分布格局被破坏。^② 上述情景表明,生物多样性遭到破坏,生态环境明显碎片化。这些均是生态恶化的直接表现。农进渔退致使鄱阳湖区缺薪少柴,民众被迫上山乱砍滥伐,水土流失加剧,导致土地肥力下降,有些害虫的天敌越来越少,农业生产中农药和化肥的使用量不断增加。近 20 年来,化肥和农药的大量使用导致生态系统中群落、种群数量减少,使其自动调节能力减弱,导致生态系统简单化。这也是近年来农作物病虫害越来越频繁和严重的重要原因。这表明农进渔退破坏了湖区原有的生态系统,直接导致渔业的衰退和生物多样性遭到破坏,湖区生态环境的恶化又反过来严重制约农业发展。

鄱阳湖区农进渔退的生态影响也会在其所处的长江中下游大系统,甚至更大的系统中反映出来。鄱阳湖区生物多样性遭到破坏,长江中下游其他水域也无法“独善其身”,洪湖的动植物种类和数量因为农进渔退而剧减的现实同样令人担忧。湖北洪湖是汉江平原大型浅水湖泊之一,1951 年时湖泊面积 760 平方千米,几经围垦减少到现在的 348 平方千米,并且由原来与长江相通的湖泊变为人工调节的半封闭性湖泊。^③ 生物多样性因此遭到破坏。洪湖经济水禽资源也大幅度下降,野鸭年产量由 35 万千克下降到 1992 年的 3.5 万千克。与此同时,水生植被的生物量由 20 世纪 50 年代的 10035 吨减少为 1991 年的 2450 吨。^④ 鱼的种类和种群数量都减少了,越少越捕不到,越捕不到就越要加大捕捞强度,造成过度捕捞。伴随鱼产量下降的是鱼的个体变小。中华鲟、白江豚和江豚,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经常出没于洞庭湖中,现在已经消失多年,表明上述珍稀动物,至少在洞庭湖区域濒临灭绝或已经灭绝。其他动物也大为减少,中科院动物所 20 世纪 50 年代末的调查显示,洞庭湖有鸭科 31 种,而洞庭湖环境保护监测站 1991 年和 1992 年只记录到 25 种。^⑤ 位于长江中游南岸,地跨武汉市江夏区和鄂州市的湖北省第二大淡水湖梁子湖,也因圩堤围垦,水面由 1956 年的 347.42 平方千米缩小近 35.2%,只剩 225 平方千米。该湖水质日趋恶化,水生植物遭到破坏,生物量降低。^⑥ 因此,农进渔退导致鄱阳湖区生物多样性遭到破坏不是个案,而是相关江河湖域的共同特征。

余 论

历史总是在曲折中发展。20 世纪下半叶鄱阳湖区农进渔退的历史,实质是一部产业转化的区域经济变迁史,核心内容是圩堤围垦。20 世纪 50 年代之前,圩堤围垦基本处于自发状态,此后则变成社会化的组织行为。从东汉开始,鄱阳湖区就有围湖造田。当时人口相对稀少,对湖区生态的影响不大。南宋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出现大规模的圩堤围垦,但依然基本处于自

① 朱海虹等:《鄱阳湖——水文·生物·沉积·湿地·开发整治》,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1997 年,第 227—228 页。

② 王晓鸿主编:《鄱阳湖湿地生态系统评估》,第 61 页。

③ 陶思明:《湿地生态与保护》,第 66—67 页。

④ 姜文来、袁军编著:《湿地》,第 143 页。

⑤ 袁正科主编:《洞庭湖湿地资源与环境》,第 370—371 页。

⑥ 李兆华等主编:《梁子湖生态环境保护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年,第 40—41 页。

发状态。明清至民国时期,江、湖关系较为协调,圩堤围垦尚在可控范围之内。资料显示,新中国成立前,鄱阳湖共被围垦1580平方千米,^①而20世纪下半叶,则被围垦1210平方千米。有关研究显示,北宋时期江西的水旱灾情相对较轻,农业生态环境总体良好。^②在明代,就全国范围而言,江西总体上不属于灾害多发地区。^③清代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区水患比鄱阳湖区要严重。^④但是,必须看到,明清及其以前时期鄱阳湖区的生态平衡是以封建生产方式下经济发展的低水平为前提的,这种不发达的环境平衡,无法满足人口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不是人类所追求的环境平衡,与我们今天所倡导的绿色发展理念具有本质上的不同。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我们分析、总结鄱阳湖区农进渔退的历史,提供了科学的理论遵循。今后鄱阳湖区的发展,应以新发展理念为先导。首要之义,即在不可超越生态平衡的“度”。当然,对于农进渔退的正向生态影响,也不可视而不见。例如关于血吸虫病的防治,1998年灾后退田还湖项目的实施致使鄱阳湖区血吸虫病疫情出现反复。^⑤这表明,农进渔退对于防治血吸虫病,是有益的。但是,如不以新发展理念为先导,一味地继续搞农进渔退,必然会导致很难逆转的严重后果。

产业转化必须考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必须践行新发展理念,这就是鄱阳湖区农进渔退历史给人们的教训。

〔作者吴贇,江西师范大学传统社会与江西现代化研究中心、江西财经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南昌 330022〕

(责任编辑:耿显家 王亚红 责任编审:路育松)

① 江西师范大学地理系课题组:《鄱阳湖区围垦的综合评价》,1986年,第7页。

② 许怀林:《江西通史·北宋卷》,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75页。

③ 方志远、谢宏维:《江西通史·明代卷》,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41页。

④ 张建民:《清代江汉——洞庭湖区堤垸农田的发展及其综合考察》,《中国农史》1987年第2期。

⑤ 万振凡等:《三峡工程对鄱阳湖区血吸虫病防治负面影响的历史考察》,《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吴贇:《20世纪下半叶鄱阳湖区“农进渔退”的正向生态效应》,《江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3年第5期。

young gentry of Changshu, this approach came from the tradition of pragmatic statecraft in the thought of the Jiangnan region; it was also influenced by Western ideas of civil rights. After the Gengzi Reform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young gentry in Changshu who accepted the *shiqi* theory became dominant in local politics, creating a new local power structure.

Britain's Negotiations with China and Japan over the "Twenty-one Demands" Hou Zhongjun(86)

After Japan handed the Twenty-one Demands to China, it sent a notification to Britain in which the fifth demand was deliberately concealed. Having confirmed the existence of the fifth demand, Britain initially understood it as a Japanese bargaining chip, but quickly changed its approach, ceasing to regard the fifth demand as an "aspiration." Britain made two proposals to Japan: first, if Japan's demands on China would harm Britain's interests there, Japan must first consult with Britain; and second, Japan should not contravene the intentions of the Anglo-Japanese alliance. The British intervention made Japan decide to suspend the fifth demand to China. Britain was deeply involved in the European theater during the First World War, so was unable to spare energy for events in the east. It did not wish to see war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so after Japan's ultimatum to China, it persuaded Japan not to resort to force while at the same time urging China to accept the ultimatum. Safeguarding Britain's interests in China was the fundamental purpose of Britain's mediation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on the Twenty-one Demands.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and Decline of Fishery in the Poyang Lake Area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Wu Zhui(104)

As a traditional industry of the Poyang Lake area, fishery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regional economy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the Republican period.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Poyang Lake area experienced a significant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and decline of fishery"; agriculture saw unprecedented development, but fishery declined rapidly. The dynamics of this process included population growth, institutional and policy changes, a natural environment which invited reclamation, and the fact that paddy fields had a higher economic value than water areas. This process caused the deterioration of the environment in the Poyang Lake area and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in general. The deterioration was mainly exhibited in frequent and intensified floods, droughts, and the destruction of biodiversity. We should analyze this phenomenon from the Marxist historical point of view in order to provide a useful historical reference for the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eco-friendly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area.

Exchange, Justice and Usury: Thomas Aquinas's Economic Ethics Liu Zhaojing(119)

Thomas Aquinas's writings on usury reflect the response of the Church to the problem of economic ethics, a problem which had a long history but which became far much important in the 12th century and especially in the 13th century. The forms in which Aquinas handles the topic—e. g. his *disputationes*—serve his economic ethics and are not open-ended. He considers usury to be legal under human law but unjust under divine law/natural law, this being in conformity with his theory of law. He thinks that the property of a thing changes with its use; keeping this in mind enables us to understand better why he sees money lending at interest to be unjust but house leasing and *societas* just. His argument that money is sterile and his attitude towards compensation for the possible loss of profits are consistent throughout, not contradictory as has hitherto been claimed. The purchasing power of money as he sees it corresponds to the price of the commodity where as lending money for *usura* corresponds to the intrinsic value of money; this does not support the